



重庆文史资料

第二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慶文史資料

第二十一輯

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市軍事委員會
重慶市地方志館 編

重庆文史资料

第二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二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本刊编号: 内字第 021 号)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198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20 元

目 录

《辛亥革命重庆纪事》序言	隗藏涛 (1)
孙中山与重庆	周 勇 (6)
辛亥革命时期的杨庶堪	马宣伟 (20)

· 纪念曹荻秋同志逝世十周年 ·

怀念曹荻秋同志	任白戈 (69)
怀念荻秋同志 学习荻秋同志	廖伯康 张文澄 孙先余 (75)
疾风知劲草 光辉照人间	洪沛然 (87)
军声振广汉 政绩遗渝州	刘连波 (93)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	黄友凡 (103)
高风亮节 永留心中	余跃泽 (108)
不屈淫威的忠诚战士	
——曹荻秋同志	郭礼华 吴锦芬 (114)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

.....	王昆仑 王炳南 屈 武 (121)
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活动	侯外庐 (132)
金满成与“人力社”	肖 林 (150)

《辛亥革命重庆纪事》序言

隗 瀛 涛

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由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辛亥革命重庆纪事》一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公开出版。

全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计三十余万言。正文分为（一）辛亥革命前的重庆社会；（二）革命力量的聚集和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三）重庆保路运动；（四）重庆独立和蜀军政府成立；（五）蜀军政府内外政策和重要活动；（六）重庆辛亥革命失败等六章。附录分为文献，回忆和见闻，大事纪三组，收录了有关重庆保路运动、蜀军政府、成渝合并、重庆镇抚府的重要历史文献八十四件，以及熊克武、张培爵等撰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本书由周勇编著。承张秀熟老人审阅提纲，并亲笔题词。承四川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隗瀛涛具体指导，并撰写《序言》。现将张老题词和隗瀛涛同志写的《序言》，先在本刊发表，以飨读者。

——编者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空前的解放，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辛亥革命是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从武昌起义发端，以各省起义和独立的形式展开，形成燎原之势。而点燃这场民主革命熊熊烈火的则是“引起中华革命先”（朱德《辛亥革命杂咏》）的四川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军起义。

重庆，是清末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同盟会重庆支部是四川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重庆辛亥革命在四川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解放以来，史学界对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重庆辛亥革命的基本特点，深入考察重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可以丰富辛亥革命史的内容，有助于更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

一九七九年，周勇同志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有志于四川、重庆近代史的研究。一九八一年，我们合著了《重庆开埠史》。在那本书里，已经涉及重庆辛亥革命。只是由于当时资料不全和限于该书体例，我们还不能全面系统地阐述重庆辛亥革命的历史，只是勾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周勇同志毕业以后，在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的同时，仍孜孜以求，搜集资料，潜心研究。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于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前夕，编著了《辛亥革命重庆纪事》一书。这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重庆辛亥革命的书，是近年来四川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作者做了

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辛亥革命重庆纪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在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考察了重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注意阐述它在近代中国，近代四川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着力研究它与近代重庆历史的关系。作者用大量史实描绘了一八九一年重庆开埠以后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貌，记述了近代重庆人民以“教案”为主要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作者对重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维新运动的论述，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重庆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近代重庆历史发展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经济是资产阶级运动的源泉。在经济落后的四川，有着象重庆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里的资产阶级运动更富于革命色彩，并且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川开展，为本世纪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作出了贡献。

二、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重庆辛亥革命的基础上，作者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作者根据大量事实提出，重庆保路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同盟会重庆支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象以成都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始终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作者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又如，作者认为，一九〇三年在重庆成立的“公强会”是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是重庆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标志。这对于丰富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关于同盟会成立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是有意义的。再如，作者对成渝合并日期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历来论者认为，成渝合并，时在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这是根据文献记载的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换算成阳历得出的。作者通过中外文献的考订，认为：三月十一日就是阳历日

期，这一天就是成渝合并的时间。由于这一时间的订正，使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出重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除四川形势的制约，重庆同盟会本身的弱点外，还受到全国辛亥革命失败的严重影响——三月十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三月十一日，成渝合并；四月一日，孙中山解职；同日，重庆蜀军政府撤销。这些观点虽属一家之言，可供探讨商榷，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已表明，重庆辛亥革命的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进展。

三、注意吸收近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果，运用新材料，发掘珍贵史料。一九八五年七月在重庆举行的纪念邹容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把邹容研究提到了八十年代的新水平。本书在邹容思想发展轨迹，历史地位，与重庆辛亥革命的关系，留日时间等方面，都吸收了会上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孙中山《关于移交川路股款筹办蜀军的命令》等文电，是近年出版的新资料（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本书运用这些新资料，对了解孙中山与重庆辛亥革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此外，作者还从重庆市档案馆、博物馆发掘了一批珍贵档案史料和图片资料，其中张培爵一九一三年撰写的《蜀军政府始末》，是首次发现的重庆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在当年写成的亲历记，十分珍贵。

四、几年来，经过广采博集，作者掌握了相当一批重庆辛亥革命的史料。这批材料，或散见于当年报刊，难以再现；或珍藏于博档两馆，难睹真容；或孤悬于海峡对岸，难成全璧；或分载于新旧书籍，难窥全豹。史料收集，确乎不易。作者从中选出部分，编成附录，贡献于学术界。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

正如中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共同关心的重要课题一样，四川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为中外学者瞩目。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我相信，《辛亥革命重庆纪事》的出版，对于推动

四川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一九八六年四月写于四川大学

孙中山与重庆

周 勇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重庆，自一八九一年开埠以后，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为四川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在近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先生虽然没有到过重庆，但重庆历史的这种巨大变化，是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影响和他对重庆民主革命运动的具体指导分不开的。

一

重庆爱国志士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形成了重庆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且在孙中山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建立了同盟会组织，担负起领导四川辛亥革命的重任。

甲午战败以后，神州大地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鲸吞瓜分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先生最先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集结力量，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当时虽然影响甚微，但代表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先声。重庆地处中国腹地，也为列强染指。一八九五年，日本乘其兵威，继一八九〇年英国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迫使重庆开埠以后，在《马关条约》中再次强迫重庆对日本开埠，从而取得了“均沾”

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特权^①。重庆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重庆的出现，改良主义思潮也得以广泛传播，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促使重庆人民进一步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途径。到二十世纪初年，重庆出现了兴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的热潮，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是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架起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重庆革命运动之间的桥梁——他们在孙中山的政治影响下完成了由爱国到革命的转变，投身于重庆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邹容和杨庶堪就是这批爱国志士的杰出代表。一九〇三年，邹容以不到十八岁的风流年华，完成辉煌的《革命军》而名垂青史，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在重庆的十六年中，已经具有了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维新改良思想，以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最后使他成为民主革命战士的，则是他一九〇一年离开重庆，特别是一九〇二年到日本以后，自觉地接受的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当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加强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邹容如饥似渴地学习孙中山的革命著作及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参加各种集会，以演讲的形式鼓吹革命，砥砺思想锋芒。一九〇三年二月，为了纠正部份留日学生“讳言排满”，不利于革命发展的思想倾向，东京留学生决定召开新年团拜会，孙中山先生为大会确定了“革命排满”的指导思想。邹容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大倡排满主义”^②的著名演说，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此为标志，邹容开始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邹容在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投身革命运动的同时，一九〇三年完成了他的不

① 关于重庆开埠问题，参见魏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第一章。

②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朽之作《革命军》，在其中第一次比较详尽、清晰地描绘了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共和国”的图景，从理论上补充和完善了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孙中山后来正是采纳了邹容的这一思想，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这是孙中山和邹容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奋斗的结晶。

一九〇三年，陈崇功、朱蕴章等一批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熏陶和反帝爱国运动锻炼的重庆留日学生学成归来，也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带到了重庆。当时，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在由爱国到革命的转变之中，各地革命力量正在积聚，准备成立革命小团体。留居重庆的杨庶堪等人，一直在暗中活动，等待时机。他们受到孙中山革命事迹及其思想的启迪和邹容革命精神的鼓舞，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感到，只有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树立革命思想”^①，才能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于是，由杨庶堪、梅际郇首倡，在重庆秘密成立了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以介绍国内外新书报刊，“倡言革命”^②为己任，创办了《广益丛报》，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及先进科学文化。以公强会为核心，形成了重庆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在全国革命小团体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开始进行建党活动。当时在日本的部份川籍留学生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重庆公强会的代表童宪章以及部份重庆学生也参与其间，他们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在建党活动中发挥了积极

① 《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二十七页；《国史馆馆刊》第一号，一九四八年九月。

② 赖肃《杨沧白先生行状》，《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

的作用。早在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成立大会之前，重庆留日学生童宪章、陈崇功、许行恽、李肇甫、刘可经等和一批川籍学生，就由孙中山、黄兴等主盟，率先加入了中国同盟会^①。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不少川籍同盟会员参加了同盟会总部的工作，重庆的李肇甫任执行部书记，直接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工作。

在建党活动中，孙中山先生就十分关注重庆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在中国西部的特殊地位，对四川、重庆的革命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②根据这一精神，同盟会章程规定，在同盟会东京总部下分设九个支部，国内设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四个，以重庆为国内西方支部所在地，负责领四川、贵州、新疆、西藏、甘肃等省的党务^③，支部下再设各省区分会。一九〇五年底童宪章、陈崇功等人，“奉中山先生命”，携带同盟会的章程誓词，计划方略回到重庆，征集革命党员^④。此时，重庆公强会已有相当规模，孙中山革命思想在重庆也更加深入人心，因此，公强会立即推杨庶堪和朱之洪“首应盟约”，改组公强会，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⑤。

同盟会重庆支部是四川最早建立的同盟会组织。它首先从学堂入手，在受过新式教育，富于反满爱国思想的青年教职员和学生中发展会员，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逐渐控制了重庆教育界，

① 《革命文献》第二辑。

② 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中国同盟会》。

④ 《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一三五页。

⑤ 《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一号。

使之成为革命阵地。同时，他们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渠道大肆进行革命宣传。一九〇六年，在东京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四期发表了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该文详细阐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同时，对民族、民权主义也作了简要介绍。一九〇六年十月，杨庶堪等立即将其在《广益丛报》上全文转载，第一次在四川将三民主义公诸报端^①。重庆革命党人还将川籍同盟会人士在日本东京创办的革命刊物《鹃声》、《四川》运回重庆，秘密发行，扩大宣传。此外还暗中进行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一九〇七年，同盟会组织的成都起义失败以后，成都同盟会组织瓦解，重庆成为四川同盟会活动的中心。

后一时期，虽然孙中山先生奔走海外，组织起义，并未亲自过问重庆的革命活动，但清政府仍把重庆地区的任何革命苗头，都与孙中山的名字联在一起。一九〇六年，重庆府发出了《奉旨严防孙文煽动密飭各属札》，要求“一体严防”“逆匪孙汶”，“随时查缉，以免勾结而靖地方”^②。一九〇八年，两江总督端方致电湖北总督陈夔龙称：“革党孙汶确欲去南京、安庆、汉口、重庆运动起事。现派浙江人余恨海，年三十余岁，及冯茂隆等（任）驻扬子江正副都督，所有军械由台湾输入重庆、宜昌一带起事”^③。

二

重庆蜀军政府是同盟会重庆支部自觉地将孙中山革命思想运用于重庆革命实践的结果，它与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同享胜利

① 《广益丛报》第一一八、一一九号。

② 《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第二十六页。

③ 《广益丛报》一九〇八年第二十六册

的喜悦，共尝失败的痛苦。

一九一一年五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川汉铁路主权，抗议清王朝卖国卖路政策。九月“成都血案”以后，又发展成为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反清武装大起义。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华侨中筹集款项，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准备回国。九月十四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近日祖国风云日急，四川已动，若能得手，则两广、云贵、三江、闽浙不得不急起而为之援应，到时弟或有不待筹款之成而立当回国也。”^①九月三十日，黄兴也致信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要他转告孙中山，“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并说，他将借助四川保路运动的声势，立即往湖北参加起义^②。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革命的高潮。

按照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的设想，“从未打算要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③，四川同盟会也就没有在新军中进行多少宣传组织工作，策动他们参加革命，因此在保路运动中，新军或者死保清朝，或者中立，基本上没有站在民众一边，这很不利于革命的发动和起义的成功。在四川，同盟会重庆支部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根据重庆的具体情况，重新修订了自己的计划。

在保路运动中，他们注意突破立宪派划定的“文明争路”的框框，把反帝爱国的保路运动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准备武装起义。同时，切实加强对新军的工作，使之成为起义的重要力量。十月，端方带兵到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五三九页。

②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

③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五四〇页。

达重庆，镇压保路运动。端方所带鄂军，其中不少人与同盟会、共进会有联系，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此，杨庶堪等早有所闻。因此，他们一入四川境内，杨庶堪就派人与之联系，并给予枪械、经费以及人员的支持，促使鄂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捕杀端方，宣布起义，最后断绝了清朝四川政府企望其中央政府支援的幻想，极大地鼓舞了四川人民的斗志。争取新军的另一工作是控制其在重庆的部队。端方率军经过重庆时，正值广东巡警道李湛阳在渝省亲。李湛阳是重庆总商会总理、西南最大票号“天顺祥”老板李耀廷的长子，曾任广东督练清兵统领，与端方要好。而杨庶堪又与李家是姻亲。端方见重庆清军不够，即命李湛阳为新军巡防军统领，招募新兵，组建防军三营。杨庶堪抓住这一机会，对李湛阳晓以大义，使其支持革命，并安插了一大批革命党人在新军之中，“党人多投身其间”^①，“是为党人得握兵柄之始”^②。此外，还通过会党，使驻重庆的清巡防军、水师炮船部队中的不少官兵愿意输诚效命，支持革命。这样，同盟会重庆支部在联络会党，组织民团商团，建立自己的武装“敢死队”的基础上，又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了一部份新军，从而最终改变了重庆地区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的力量对比，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动起义，迫使“官吏俯首听命”、“兵不血刃，垂手而克复名城”^③，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重庆蜀军政府。

重庆蜀军政府是以同盟会重庆支部为核心，按照同盟会的纲领建立，并得到先期独立的各省军政府通电承认的“四川政治中枢”，“四川人民代表”^④。成立之始，南京临时政府尚未建立，

① 熊克武《辛亥革命纪事》。

② 张培爵《蜀军政府始末》。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第十二页。

④ 张培爵《蜀军政府始末》。